

全俄政治罢工¹

10月26日(13日)于日内瓦

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今天的一些外国报纸在刊载有关全俄政治罢工迅猛发展情况的电讯时这样说。

不仅晴雨计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而且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猛攻象巨大的旋风一样已经把一切的一切都卷走了。革命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各种事件频频发生，假使我们要向读者叙述最近三四天的详细情况，那就得写一整本书。详细的历史还是留待后人去写吧。我们面前是人类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内战、一次争自由的战争的动人情景，应该赶快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这场战争。

暴风雨来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关于杜马的议论、设想、推测和计划，现在显得多么渺小！我们关于杜马的一切争论在几天、几小时之内就已经完全过时了！我们中间有些人曾经怀疑革命无产阶级是否有力量使警察内阁的这出丑剧停演，有些人不敢大胆谈论抵制选举的问题。选举还没有在各地开始，只一挥手这个纸牌搭成的房子就晃动了。这一挥手，不仅迫使自由派和胆小的解放派，而且迫使维特先生这位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首脑也谈论起（诚然，暂时还只是谈论）进行改良以消除整个布里根把戏中的一切阴谋诡计来了。

这只稍一挥动就使杜马问题发生转变的手，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手。有一首德国社会主义的歌中唱道：“一切轮子都要停止转动，只要你那强壮的手要它停止。”² 现在这只强壮的手举起来了。我们曾经指出和预言过，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在武装起义事业中有伟大的意义，这一点已经被光辉地证实了。全俄政治罢工这一次真是席卷全国，它在最受压迫的和最先进的阶级的英勇奋斗中，把万恶的俄罗斯“帝国”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了。在这个充满压迫和暴力的帝国中，各族无产者正组织成为一支争取自由、争取社会主义的大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分享了革命的无产阶级首先发难的荣誉。两个首都都罢工了。芬兰也在罢工。由里加带头，波罗的海沿岸边疆区也参加了这一运动。英勇的波兰重新参加了罢工者的行列，这好象是对敌人的无可奈何的愤怒的一种嘲笑，因为敌人幻想用自己的打击粉碎它，结果只是使它的革命力量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克里木（辛菲罗波尔）和南方起来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构筑街垒，进行流血斗争。伏尔加河流域（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下诺夫哥罗德）在罢工，中部农业省份（沃罗涅日）和工业中心（雅罗斯拉夫尔）也爆发了罢工。

站在这一多民族的千百万工人大军前列的，是铁路员工工会³的小小的代表团。自由派先生们在舞台上演出政治闹剧，对沙皇低声下气，花言巧语，对维特扭扭捏捏，装模作样，工人冲上了这个舞台，向新的“自由派的”沙皇政府的新首脑维特先生提出了最后通牒。铁路工人代表团不愿等待召集“市民参议会”，不愿等待召集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团甚至不愿花费宝贵的时间来“批评”这出装模作样的闹剧。工人代表团准备首先用行动——政治罢工——来批评，然后向小丑大臣说：只能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在实

普遍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召集立宪会议。

小丑大臣说话了，正象铁路工人恰如其分地形容的那样，“他真是官气十足，总是支吾搪塞，不说一句肯定的话”。他答应下令实行出版自由，但是不同意实行普选；根据国外电讯的说法，他说过“现在不可能”召集立宪会议。

于是，工人代表团宣布了总罢工。工人代表团离开这位大臣来到那个有上万人在举行政治集会的大学。无产阶级成功地利用了革命大学生提供的讲台。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学校、工厂和街头上的最初的、群众性的、有秩序的、自由的政治集会上，人们讨论着小丑大臣的回答，谈论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的任务是要使立宪会议的召集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外国资产阶级报刊，甚至自由主义色彩最浓的报刊，都在惊恐地议论人民自由集会上的演说者所宣布的“恐怖的和暴乱的”口号，似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是沙皇政府自己的全部压迫政策引起的。

起义即将爆发，我们眼看着它从全俄政治罢工中成长起来。任命一个硬要工人相信“现在”不可能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小丑大臣，这清楚地表明革命力量在增长，沙皇政府的力量在削弱。专制制度已经没有力量公开反对革命，革命也还没有力量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这两种差不多势均力敌的力量的消长，必然使政府当局惊慌失措，不得不由镇压转向让步，颁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令。

前进，向新的、更广泛、更顽强的斗争前进，不要让敌人清醒过来！无产阶级已经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奇迹。全俄政治罢工大大加快了革命的胜利，使敌人感到末日的恐怖。但是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可以做到和应该做到的一切。斗争正

在接近真正的结局，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结局。正是现在，工人阶级正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武装起来。这样，最后，它一定会完全消灭可恨的专制制度，赶走所有的小丑大臣，成立自己的临时革命政府，并且向俄国各族人民表明，正是‘现在’“可能”而且必须召集真正全民的和真正立宪的会议。

载于 1905 年 10 月 18 日(31 日)
《无产者报》第 23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12 卷第 1—4 页

势 均 力 敌⁴

(1905 年 10 月 17 日 (30 日))

(1)到目前(10月30日(17日),星期一)为止的结果是势均力敌,这一点我们已经在《无产者报》⁵第23号上指出过。

(2)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取胜,——革命还没有力量取胜。

(3)由此产生极大的动荡。革命事件风起云涌(罢工、群众大会、街垒、社会保安委员会、政府陷于完全瘫痪,等等)。

——另一方面,没有进行坚决的镇压。军队发生了动摇。

(4)宫廷犹豫不决(据《泰晤士报》⁶和《每日电讯》⁷报道):是独裁还是立宪。

宫廷在犹豫并且伺机而动。从他们那方面来说,这是一种正确的策略:势均力敌迫使他们伺机而动,因为政权在他们手中。

革命已经发展到不利于反革命进击和进攻的时刻。

对于我们,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彻底的革命民主派来说,这还不够的。如果我们不再上升一步,如果我们不能担负起独立进攻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粉碎沙皇政府的力量,不能摧毁它的实在的权力,那么革命就会半途而废,资产阶级就会牵着工人的鼻子走。

(5)传闻立宪已定。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沙皇考虑到了

1848 年革命和其他革命的教训：不要立宪会议，在立宪会议之前，不经过立宪会议而恩赐宪法。什么样的呢？最好（对沙皇来说）是立宪民主党人⁸ 的。

这件事情的意义：实现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想，越过革命。这是欺骗人民，因为仍然不会有完全的和实在的选举自由。

革命是不是应当越过这个恩赐的宪法呢？

载于 1926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5 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12 卷第 5—6 页

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

(1905 年 10 月 18 日 (31 日))

我们在上一号刊登的关于俄国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⁹的报告，使我们有可能就目前的政治派别划分问题作出几点即使是初步的总结。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崩得¹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¹¹、波兰社会民主党¹²和乌克兰革命党¹³）的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积极抵制国家杜马的策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不分民族差别，现在都认为必须真正加强反对国家杜马的鼓动，必须进行鼓动反对所有主张参加国家杜马的政党，最后，必须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我们《无产者报》从第 12 号就开始为之辩护、而且辩护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那个策略的各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所有俄国社会民主派的策略原则，只有一个可悲的例外。

读者知道，这个例外就是《火星报》¹⁴和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少数派”。“组织委员会”——少数派的实际上的中央——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投了什么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组织委员会拒绝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上签字却是事实。在新火星派的南俄“成立”代表会议¹⁵通过了那个非常不恰当的、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这个决议我们

已经在《无产者报》第 21 号上作了详细的分析^①)以后,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情。

可见,政治派别的划分已经形成了。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可以说还是第一次使得各个反对党和革命党、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刊来共同讨论政治策略。这和前一个时期的运动比较起来,是前进了一大步。以前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之间有一道鸿沟。现在运动仅仅经过 10 个月的巨大发展,就把这条鸿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填平了:革命斗争已经把“公开的”反对派的热情激发到顶点,几乎达到承认革命事实的地步。老实说,以前我们是不可能同公开的反对派的代表就策略和各政党的行动问题进行争论的,因为那时除了革命的、秘密的政党,就没有别的政党,撇开专制政府及其仆从的“活动”,一切“政治活动”就都是“政治犯”的活动。现在国家杜马自然而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成了全体人民群众、各种人物、各党各派的讨论对象。革命斗争已经为公开的报刊、地方自治会议、大学生集会和工人群众大会开展革命的讨论创造了条件。

关于如何对待国家杜马的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由那些同沙皇的施舍最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早在 8 月 6 日诏书¹⁶颁布以前就最了解这种施舍的地方自治人士和激进知识分子首先开始的。后来这个讨论才在俄国的一切政治报刊上展开,即在自由的(即秘密的)报刊和公开的报刊上展开。前者明白说出自己的全部理由和口号,后者则用伊索式的语言表示赞成抵制或自由地反对抵制。

^①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11 卷第 356-372 页。——编者注

政治派别划分是俄国各民族的政党和阶级的界限日趋分明的先兆，它正是在抵制问题上开始出现的。参加杜马，还是不参加杜马？取消杜马，还是接受杜马？是在杜马中、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还是在杜马外、不经过杜马来反对杜马，——问题就是这样不可避免地摆在一小撮享有特权的选举人和“无权的”人民群众的面前。至于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当然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案和种种“特殊意见”，但是从一切报刊的论调和一切政治组织、政治会议、集会等等的全部声明来看，现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舆论‘调查’总结了。

总结如下：

对杜马的三种主要看法是很明显的，而且同当前革命中的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社会力量完全符合：黑帮（专制政府）的看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看法和革命派（无产阶级）的看法。黑帮抓住杜马不放，认为它是最好的、唯一可以利用的、甚至是唯一可以设想的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自由派尖锐地批评了杜马，但是接受了杜马，他们被合法的道路和同沙皇的妥协强烈地吸引住了。以无产阶级为首的革命人民则鄙视杜马，宣布积极抵制杜马，并且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要把这种积极抵制变成武装起义。

这三种主要的看法值得比较详细地谈一谈。

谈到黑帮，那么可以预料，这些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将会象我国御用报刊常说的那样，直接或间接地赞同抵制或缺席主义（作这种预料的还有那些想要认真对待杜马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甚至还有火星派）。这些人是想说：就让他们抵制好啦，这样对我们会更好些，杜马中的黑帮成员会更一致，更纯洁。既然俄国保有保守的机关报刊，它们能够攻击沙皇大臣的过分的自由主义，能够对

“过于软弱的”政府表示不满，那么这种看法就完全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甚至可能比立宪派的许多看法表现得还要明显。但是这里也表现出那些认真对待杜马并且开始谈论要以杜马为基地进行斗争、要在杜马中支援斗争等等的人们的错误。这里也立刻可以看出专制制度十分需要合法的杜马反对派，非常害怕抵制。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如果不和哪怕是一部分资产阶级互相勾结，就根本不可能统治国家，这是毫无疑义的。不和资产阶级的右翼互相勾结，就不可能统治国家，不可能弄到金钱，不可能活下去。我国的专制制度虽然带有亚洲式的野蛮习气，带有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原封未动地保存下来的许多原始的野蛮习性，但是我国的专制政府毕竟是一个和欧洲、和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俄国专制制度对整个俄国资产阶级的依赖是最有力的物质依赖，这种依赖可能为许许多多中世纪的附加物所掩盖，也可能为千百万次个人的或集团的宫廷购买（官衔、职位、特权、赠与、纵容以及其他等等）所削弱，但是一旦到了国民生活的决定关头，这种依赖就一定会以决定性的力量表现出来。

我们现在看到，维特先生跑在自由派的前头，公开的报刊已经报道了他发表的自由主义的言论，他同立宪民主党领袖“盖森先生进行非正式的谈判”（《泰晤士报》驻彼得堡记者的电讯），外国报刊上充满了关于沙皇的自由主义计划的消息，等等，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当然，这里面包含着无数的谎言和阴谋，但是沙皇政府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政府要不撒谎，不搞阴谋，它们的政策就一步也推行不了。当然，由于法国和德国的银行家代表到彼得堡来就沙皇政府极其需要的 5 亿卢布的新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产生了许多极其卑鄙的欺骗行为。不过，政府那样依赖资产阶级，他们在互相勾

结、狼狈为奸时必然会产生欺骗行为，因为这种依赖就是靠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来实现的。

专制政府必须同资产阶级‘和解’，而且它不得不努力这样做，——自然，它还想①愚弄欧洲和俄国的舆论。而国家杜马正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的手段。杜马中合法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正是资产阶级所承认的国家制度的外表，这种外表可能还会帮助专制政府摆脱窘境。

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莫斯科新闻》¹⁷ 这家保守的反对派的机关报不是幸灾乐祸地，也不是冷嘲热讽地，而是慷慨激昂地，怒不可遏地谈论着抵制杜马。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黑帮的机关报《新时报》¹⁸要猛烈攻击“缺席主义者”，甚至企图把倍倍尔也拉来同抵制的思想作斗争（《无产者报》第 20号^②）。黑帮害怕抵制。现在只有瞎子或极力为自由派辩护的人才能否认下面这一点：如果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代表大会活动家赞成抵制的话，那么抵制的胜利就会得到绝对的保证。

但是问题在于，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它整个根本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向往君主制、两院制、秩序、适度，热中于同‘经常闹革命’的“恐怖现象”以及同法国式革命的‘恐怖现象’等等作斗争。自由派资产阶级、解放派¹⁹和立宪民主党人从激烈谈论抵制转到坚决反对抵制，是整个俄国资产阶级采取的第一个巨大的政治步骤，这个步骤证明了它的背叛本性，证明了它“准备要犯”那种叫作背叛革命的‘罪行’。这并不只是准备（也许解放派法学家当中某个爱说俏

①手稿上在“想”字后面是：“只装装样子，好象它和解了，它想”。——俄文版编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98页。——编者注

皮话的人会反驳我们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制裁的），而是犯罪未遂，甚至是已经完成了的犯罪。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唤起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按照不适用于革命的普通年代表来算，那是才过去不久）。甚至我们需要帮助资产阶级组成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现在它们已经觉醒了，它们已经组织起来了，提到日程上来的完全是另外的伟大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和现实的，只是由于革命一日千里地发展。这就是同沙皇妥协的任务（资本的任务）和使背叛的资本中立化的任务（劳动的任务）。

领导着革命人民的革命无产阶级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义务，它已经担负起这项任务：唤起、推动和提高自己的那些反对中世纪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伙伴”，从而使他们从不太革命的伙伴转变为比较革命的伙伴。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革命无产阶级“认真对待”的不是杜马，而是激进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由于轻率、极端幼稚和一时的兴致而脱口说出的关于抵制杜马的言论、许诺和口号。无产阶级已经把抵制杜马的言词变为现实，即直接而公开地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仅展开了极其广泛的鼓动工作，而且展开了直接的街头斗争（在莫斯科），同广大的、虽然阶级态度还不十分明确但是备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先进部队——激进的青年结成同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是在实际的战斗任务上同觉醒了了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各阶层团结一致的，并没有签订任何协定或任何条约。在莫斯科事件的伟大日子里（这次事件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是一个先兆，而不是由于这一事件本身），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向专制政府进行斗争，而自由派、解放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同专制政府进行谈判。

政治派别划分的情形是这样的：一派拥护杜马以保存专制制度，一派拥护杜马以限制专制制度，另一派反对杜马以消灭专制制度。换句话说，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镇压革命，一派拥护杜马是为了遏制革命，另一派反对杜马是为了把胜利的革命进行到底。

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是一个例外，一个破坏了清楚的阶级营垒划分完整性的可悲的、令人遗憾的例外（象其他一切例外一样，这一例外也证实了常规）。但是在这个例外中，在国外的秘密组织的狭小范围内，却表现出我们已经预言过的那个非常重要非常有教益的规律。我们在上面谈到的那个代表会议，团结了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火星报》仍然同《解放》杂志²⁰联合在一起，并不是由于条约的约束，而是由于局势的发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在秘密报刊上主张积极进行抵制。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右翼则起来反对抵制。

这样，对新火星派的最重要的策略决议所作的分析（列宁的《两种策略》^①）就得到了证实，即《火星报》降到自由派地主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农民群众提高自己的水平；《火星报》降到^②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无产者报》则把革命的^③小资产阶级提高了。

熟悉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的人都知道《火星报》老早就说过这样的话：布尔什维克和《无产者报》已经摇摆到社会革命党²¹方面去了，摇摆到极端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去了。这句话和各种流行

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8—29页。——编者注

②手稿上“到”字后面是：“君主派的”。——俄文版编者注

③手稿上“革命的”一词后面是：“和共和派的”。——俄文版编者注

的话一样，有一部分真理。这句话所表露的并不是火星派的单纯的恼恨，而是反映了真实的现象，但它是象凹面镜反映物体那样反映的。这种真实的现象就是这样一件事实：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因为火星派转向了机会主义，所以他们必然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用 18 世纪的政治划分的语言来说）是“雅各宾派”²²。这些指责只能证实我们对目前社会民主党的左右两派的看法是正确的。对于机会主义者的这些指责我们是引以为荣的，正象 1900 年《工人思想报》²³ 指责我们有“民意主义”²⁴ 时我们引以为荣一样。现在全俄国的一切政治派别在最重大的策略问题上产生的真正政治派别划分，实际上证明了我们对于火星派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²⁵ 以来所采取的整个立场的评价是正确的。

一切社会民主派的代表会议所完成的秘密政党的派别划分，自然也就补充了一切政党在杜马问题上的派别划分。要说火星派是个令人遗憾的例外，那么他们是例外这一事实却再一次使我们相信规则的力量，相信革命的社会民主派一定会胜利，相信俄国革命一定会实现它的一贯的口号。在意气消沉时期，自由派的庸俗行为和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虽然象是一种预兆，表明我国的革命将要象 1848 年的德国革命一样，成为庸俗的、虎头蛇尾的、半途而废的革命，可是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各项原则的生命力赋予我们以振奋精神的信心，而英雄的工人阶级的发动则更加加强了这种信心。革命清楚地划分了各个政治派别的界限，很好地证明了那些错误意见是荒谬的。从目前的国内外形势看，希望俄国革命获得完全胜利是有充分根据的。专制政府已经心慌意乱，自由派已经茫然失措，而引导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则革

命干劲十足，——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相信：“我国列车的行驶将超过德国的列车。”²⁶

载于 1905 年 10 月 18 日（31 日）
《无产者报》第 23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12 卷第 7—15 页

失败者的歇斯底里

(1905 年 10 月 18 日〔31 日〕)

在我们的《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一文写好以后，我们收到了《火星报》第 112 号，上面登着一篇神经质的、充满了愤怒、眼泪、大声喊叫和怪腔怪调的文章《小组习气的产物》。这篇文章只能叫作歇斯底里，不能叫作别的。要从歇斯底里的号叫中找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论据，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既然你们自己自愿出席俄国各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组织的代表会议，小组习气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你们还没有完全失掉思考的能力，那就请你们哪怕是稍微想一想吧，哪怕是在你们的歇斯底里发作过后想一想吧！既然你们同意出席代表会议，既然你们的代表参加了代表会议，那就意味着，你们自己承认这个会议是一件严肃的、党的、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事情。既然你们自己自愿参加这个会议，这一行动就表明你们承认召开这个会议是严肃的和必要的事情。可是你们在会上遭到失败以后，却开始骂起人来，你们这样做只能让稍有头脑的工人都瞧不起你们！

你们之所以不满，是不是因为，你们认为，会议对你们的策略的责备太尖锐了，竟把参加杜马叫作背叛自由事业？但是，可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是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道参

加代表会议的，而这个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老早就在小册子和文章中指出你们已经变成君主主义自由派政党的走狗，这一点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这一点你们是很清楚的，如果你们现在气得发昏，老实说，我们实在爱莫能助。要知道，在俄国各民族一切秘密的政党，组织、派别和机关报之中，只有你们还和《解放》杂志搞在一起，这是事实，是无法抹杀和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对你们的最尖锐的、历史上空前尖锐的谴责，而你们却以为尖锐的根源是“背叛自由事业”这个字眼！

你们是这样惊慌失措，在会议上遭到失败以后竟大叫大嚷，说崩得和其他民族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所维护的组织上的联邦制是有害的。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这样做很不明智，这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你们失败的惨重罢了。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好好想一想：事实上是谁两年来维护了而且现在还在维护组织上的涣散和模糊，维护协议和分权制的原则呢？正是你们新火星派。正是崩得、拉脱维亚和波兰社会民主工党中的联邦主义者曾经在报刊上响应你们所有的破坏组织的言论来反对所谓集中制的极端表现等等。上述各个党中的一切联邦主义者都曾经写过和发表过与少数派观点相同的文章，这也是事实，是无法抹杀和无可争辩的事实。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你们看，你们重新提起联邦制是多么不合时宜：你们这样做，只是更加突出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的崩得、拉脱维亚党和波兰党内昨天同情你们的人忍受不了你们的杜马策略的庸俗，不得不抛弃你们了！不，亲爱的《火星报》同志们，如果你们平心静气地稍微想一想，那你们自己也会看到大家都看到的事情：不是“多数派”接受了联邦制，而是崩得、拉脱维亚